

● 语言学

言语风格学与汉语古文献辨析

骆 瑞 鹤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骆瑞鹤(1957-),男,广西恭城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古籍研究所副教授,主要从事音韵、训诂学研究。

[摘要] 言语风格学是语言学一个分支学科,而古文献辨析则是古典文献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关系密切。言语风格学的一般理论对古文献辨析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以言语风格学指导古文献辨析工作是可行的,反过来,古文献辨析的成果也能进一步丰富言语风格学理论。

[关键词] 言语风格;汉语古文献;语言学

[中图分类号] H1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1)06-0745-05

“风格”一词在我国原为文学批评术语,主要指作家的创作倾向。20世纪60年代以后,我国语言学家根据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的相关论述,经过长期研究,并借用文论中的“风格”一词,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言语风格学。郑远汉先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言语风格学》一书,应是我国言语风格学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言语风格学》从广义的角度论述了言语风格表现,将言语风格分为非共同体风格和共同体风格两大类。非共同体风格包括言语民族风格、言语时代风格和言语个人风格;共同体风格包括功能语体和交际风格。在本文论及的言语风格学与汉语古文献辨析这一命题范围内,非共同体风格说尤其具有理论价值。非共同体风格说阐述的不同语言之间的风格关系,虽然对汉语古文献辨析没有直接作用,但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关于汉语的言语时代风格及言语个人风格的论述,则在古文献的辨析工作中意义特别重大。

汉语古文献的情况十分复杂,其重要表现是作品的时代往往难以确定,作品的作者归属难以确定,这使作品在其它方面定位有困难。因而,对具体作品的辨析有两方面的重要任务:一是辨伪,即明确某作品是否某时代的真实作品;二是辨异,或说别异,即明确某作品系何人所作。本文所谓古文献的辨析,即指辨伪和辨异。辨伪涉及言语的时代风格,辨异涉及言语的个人风格。所以,言语风格学所论述的言语时代风格,即不同时代的言语之间的风格差异,对古文献作品的时代真伪鉴别具有指导意义;所论述的言语个人风格,即“不是受制于社会的功能变体,而是仅仅受制于个人的言语差异^[1](第19页)”,对古文献作品的作者归属的判定具有指导意义。

不论是辨伪还是辨异,古代学者在方法上多重视于从作品的思想表达、政治制度、地理变迁、目录记载、别书征引、艺术风格上进行分析。至近代,才有人自觉地从语言学角度进行辨伪。《伪书通考·总论上》载胡适辨伪之法,有“文字”一项,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字,不致乱用^[2](第8页);又载梁启超从文章学角度立论,列出名词、文体、文法、音韵四项^[2](第12页)。但民国以来,从语言学角度对古文献进行辨伪与辨异,成果仍然不著。赖言语风格学的建立,将使辨伪与辨异工作更加条理化科学化,结论将更有说服力。

力,因而更为可靠。今先以《尚书》《列子》几件事为例,说明从言语风格上进行辨伪的可行性。

《尚书》中有《五子之歌》一篇。所谓“五子之歌”,是夏太康时代的五篇歌辞。这五篇歌辞,用韵时韵类合乎古音,问题就出在用韵形式的风格上。第一歌 15 句,第二歌 7 句,第三歌 5 句,第四、五歌并 8 句。第一歌最复杂,今即以为说。其歌辞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马。为人上者,柰何不敬。”^[31](第 156 页)此歌按意思当分为三章,首 5 句为一章,次 6 句为一章,末 4 句为一章。其用韵情况,则第一章训、近、本三字相押(諄韵);第二章下、予、明、图 4 字相押(鱼阳通韵),妇、失二字相押(之质合韵)^①;第三章马、者为韵字(鱼韵)。“五子之歌”是民歌性质的,其用韵风格应与《诗经》中的《国风》作品以及一些《小雅》作品相仿,但其实不然。《国风》作品用韵形式虽然多样,但以下五例似可概其全:一韵终篇(章)之例;中间换韵之例;隔韵之例;遥韵之便;句中韵之例。“五子之歌”第一歌第一章,以 1 2 4 句入韵而 3 5 句不入韵。考《国风》《小雅》五字句式的诗篇,得十余首(章),第五句没有不入韵的。进一步说,不仅《国风》《小雅》234 篇,整部《诗经》凡有韵之诗,各章末句都入韵。若以为諄、耕合韵(宁是耕部字),则 1 2 4 5 句入韵,第三句不入韵,《诗经》中亦无此例。第一歌第二章,前四句用隔韵,后两句又承前 1 2 句为韵。而《诗经》六句式诗章中,若前四句用隔韵,则后二句之韵,必是承二、四句之韵,无一例外。第一歌第三章二、三句押韵,一、四句不入韵,《诗经》中没有这种情形。若将第一歌 15 句作一章看,则韵式混乱杂沓,更不合上古诗歌用韵体式。我们再摘《尚书·益稷》所载古歌:“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时惟畿。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乃赓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31](第 144 页)这是著名的“赓歌”。赓歌用韵特点是几乎句句入韵;若不计起歌,则句句有韵。这与《尚书大传》卷一所载舜时卿云歌《韩诗外传》卷二所载夏桀时群臣所歌用韵之例略同。将“五子之歌”与《诗经》、赓歌等古歌比较,知“五子之歌”在语音表达这一点上言语风格很不同于《诗经》、赓歌等,应判为伪歌。

《五子之歌》在列太康昆弟五人之歌时,依次说“其一曰”至“其五曰”。“其一”等都是表示序数的定中结构。这个结构,似表示“其中第一人”,又似表示“其中第一歌”,文意不甚明了。这种其字结构,在《尚书》中无它例。“其”字在今文《尚书》中一作语气词(与甲骨文、《周易》经文用法相同),一作定语。作定语时,所限定的都不是数词。将“其”字用于数目字之前,《左传》有这种用法,但只限于叙《诗》中某一首的章次,指向至明,而至最后一章,则说“其卒章曰”^[31](第 1882 页),不再用数词,此与《五子之歌》合叙五人次第或五人作品次第的方法仍有重要区别。又《列子·周穆王》:“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41](第 110 页)“都”是“尽”的意思,与“除”成状中结构。“都”的这种用法,与先秦人的用法反差极大,倒与《世说新语》“都”字用法完全一致^[41](第 332-335 页)。又如《尚书·胤征》记夏代仲康时事,篇中有“每岁孟春”、“火炎崑冈,玉石俱焚”等语。先秦人可说每人、每事,但不说每岁每年。玉石俱焚,也不是先秦说法,这种说法始见魏晋之间,或作“玉石俱碎”^[51](第 366-367 页)。从语法、词汇(用语)上考察,《尚书·五子之歌》《胤征》以及《列子·周穆王》诸篇,言语风格与先秦时代不同,作为先秦书篇对待是有疑问的。

我们考辨某一书篇,假如有了其它的证据,而再合以言语风格考察,那么证据将更为充分;假如缺乏其它证据,那么言语风格将成为主要依据,因为言语风格总是存在的。由此可知,言语风格学在古文献辨伪中应有其重要地位。

运用言语风格学理论进行汉语古文献辨伪,涉及到古代汉语的断代问题。诚然,古代汉语的断代仍不十分明确,但经历代学者的努力,大致轮廓已经凸现。语音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将语音划分为上古音、中古音与近代音几个阶段,早已有共识。词汇方面,专有词汇代不相同,容易考见;一般词汇,虽然许多是历代承用的,但或词义不同,宋代以来特别是清代以来已有可观的研究成果,靠汉语词汇史专家进一步总结。语法方面,清末民初以来的大规模研究,成绩也很可观,足资利用。近年来学者重视古籍专书语法研究,其成果为古汉语语法断代提供了新的证据。

除传统语言学所指的语音、词汇、语法外,运用言语风格学理论进行古文献辨伪,还涉及到句式选用、句群组合、篇章结构、修辞特点等等,甚至文字的应用。因为从本质上讲,言语风格学是一种广泛意义

上的语法学,可以包括语用的各个方面,也与古文献言语辨伪要求相符合。应当承认,从言语角度对古文献进行章法、修辞等方面的研究,目前尚处于薄弱阶段,有待进一步加强,以在这些方面区别古文献的时代风格。这要求我们对古文献各时代的代表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以确定古文献作品在这些方面的言语时代风格特点,不仅为古文献辨伪工作服务,而且也能为言语风格学的论述提供更多的可靠材料。

就共同体风格而言,汉语古文献作品可分为白话文与文言文,或说口语体与文言体,其中文言文是通用体。当然,也有介于这两者之间的风格,但我们可视其文、白成分的多少将作品分别划入上述两体。这是以现代汉语为出发点进行区分的,因此较古的口语记录如《论语》中所表现的仍被视为文言。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动,民族的融合,方言的相互渗透等,先秦口语书面语,至汉代已变成“文言”,需要训诂,这表明先秦口语与汉代口语言语风格不同。汉代口语与后世口语的关系也如此。《史记》、《论衡》、《参同契》、《太平经》、《风俗通义》等文献中夹带体现的两汉口语,与《世说新语》、《颜氏家训》、隋唐佛教变文中的六朝隋唐口语言语风格不同;《世说新语》等文献中的口语,与赵宋以来佛教语录、理学家的讲义、白话小说中的近代口语言语风格不同。时代离现在越近的口语,言语风格与现代汉语越相近。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以区别不同时代的口语,为汉语古文献辨伪服务。

作为古文献作品中共同体风格的通用体文言文,时代风格可能不如白话明显,但也不是不可划分的。文言文作者虽然以先秦两汉文章为标准加以模仿,但下笔时却总是受当代言语习惯和前代言语作品的影响,几方面的结合,形成文言文的言语时代风格。这就是为什么唐宋古文不同于先秦两汉,宋以后文言不独不同于先秦两汉,也不同于唐宋。例如宋以后文言或古文,情况往往是,它既要三代秦汉文章为基础,又要以唐宋古文为标准,又或多或少受科举程文的影响,又受当时言语习惯的渗透,言语风格自然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甚至汉语古文献中有不少模仿针对性很强的作品,也有言语时代风格之别。例如苏辙《大诰》、卫元嵩《元包经》之类文字,与《尚书》、《周易》相比,似是而非;白居易作《补逸书》,号可以求真,但行文流畅,措词排偶,具有典型的唐代文言文言语时代风格。一个作家总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有自己独特的经历和学养,又受当时的语言环境制约,因此其言语时代风格很难完全超越自我。

因为汉语古文献作品确实存在言语时代风格,所以,以言语风格学理论为指导,从言语上对有时代疑问的文献进行断代和辨伪,是完全可行的。

《言语风格学》不仅论述了言语时代风格,而且论述了言语个人风格。在论述言语个人风格时,举例比较了老舍与赵树理、毛泽东与刘少奇、贾政与刘姥姥的言语个人风格。古今一体。当代文献有言语个人风格,同样,古代文献也存在言语个人风格。尤其是那些刻意进行自觉创作的作家,其言语个人风格更为显豁。因此,只要有一定参照作品存在,对于作者归属有疑问的古文献作品,我们就可能运用言语风格学理论指导辨异。今试以唐诗一首为例。

《全唐诗》卷65《罗隐三》有《登高咏菊尽》一首,原注:“一作李山甫诗。”诗全文:“篱畔霜前偶得存,苦教迟晚避兰荪。能销造化几多力,不受阳和一点恩。生处岂容依玉砌,要时还许上金罍。陶公没后无知己,露滴幽丛见泪痕。”^[6](第7548页)《罗隐集·甲乙集卷三》亦载此诗,文字全同。雍文华校云:“《唐诗统签·戊签》注云:《甲乙集》有《咏菊》‘篱畔霜前’一篇,寔李山甫诗误入者,今删去。”^[7](第50页)再检《全唐诗》卷六四三《李山甫》下第一首《菊》即为此诗,但有十来个字不同。为便于观察比较,今不嫌繁碎,亦全录于此。《菊》:“篱下霜前偶得存,忍教迟晚避兰荪。也销造化无多力,未受阳和一点恩。栽处不容依玉砌,要时还许上金尊。陶潜没后谁知己,露滴幽丛见泪痕。”^[6](第7361页)以此较之罗隐名下的诗,虽有时用字不同,但诗的主干与枝叶并相同,即诗意同、用韵同、句法句式同、主要用词同、修辞同、篇章结构同,因此可以确定是一首诗。明代胡震亨编《唐诗统签》时认为此诗当是李山甫作,故于罗隐名下删去。《全唐诗》编者据《甲乙集》所载,于罗隐名下不删,又同收入李山甫名下。《罗隐集》编者据《四部丛刊》本《甲乙集》,亦予保留。如此看来,此诗作者归属未能判定。

此诗作者之归属到底如何,从年代上不能判定。这是一首借写物来达意的抒情诗,不涉具体年月。且李山甫、罗隐二人同为唐末人,也不是从年代上分析。诗中借菊流露出哀婉无奈之情,同时表达了铮铮而

清高的品性。首联叹出身寒微,又生不逢时,仅得存活而已。颌联谓自己在当世无足轻重,更无人关照提携。颈联喻天使我不能参与政事,但我仍是有才华的,表现了一种坚定的自信。结联以古人为知己,抒写了深深的幽怨。全诗温柔敦厚,哀而不伤,深得古诗教遗则,有较高艺术性。李山甫、罗隐二人不仅同生唐末,且都考进士不第,又同为藩镇做过事,行藏惊人地相似,因而他们的创作风格也十分相似,就此诗的艺术风格而言,也难以考察作者为谁。那么,我们只有尝试从言语个人风格上作分析比较了。

《言语风格学》在论到言语个人风格的分析方法时指出:“风格成分不是虚的,而是在一定的词语句法、话语组织、修辞方式的选用等方面体现出来,分析言语个人风格就要在这些方面作出具体的统计和比较。”^[11](第 99 页)这种具体的言语分析法,与艺术风格分析法的笼统性不同,应是更为行之有效的办法。李山甫诗今存 90 余首,罗隐诗今存约 480 首,这是我们对《登高咏菊尽》(《菊》)一诗进行言语个人风格分析的参照作品。李、罗二人所存诗作绝大部分为律诗,而《登高咏菊尽》(《菊》)也正好是一首律诗。当时律诗在用韵上有《唐韵》及《唐韵》变通的规范,在音律其它方面有律诗的内部要求,在对偶上有一定限制。李、罗二人都是律诗创作高手,因此,我们不能从律诗创作的基本规范上来区分此诗的言语个人风格。我们尝试从字词惯用、词语组合方式上地行一些考察,以此跟李、罗二人作品对照,从而初步推定该咏菊诗谁作。

我们认为,该咏菊诗在用词方面,比较典型的或说最有特色的应是颌联中之“造化”、“阳和”、“点”三个词。“造化”、“阳和”是名物词,而“点”是名量词。这三个词在李山甫诗中已重复运用。“造化”重用一次,即《风》:“深知造化由君力,试为吹嘘借与春。”^[6](第 736 页)“阳和”重用一次,即《柳十首》之三:“长恨阳和也世情,把香和艳与红英。”^[6](第 737 页)“点”重复二次,即《寒食二首》之一:“有时三点两点雨,到处十枝五枝花。”^[6](第 736 页)《寄卫别驾》:“云盖数重横陇首,苔花千点遍松阴。”^[6](第 739 页)“三点两点”今作一次计。今存罗隐诗数倍于李山甫诗,不重复“造化”、“阳和”二词,表明罗隐作诗没有使用这两个词的习惯。罗诗也用“点”,但用法不同。《中元甲子以辛丑驾幸蜀四首》之二:“爪牙柱石两俱销,一点渝尘九土摇。”^[7](第 129 页)“点”当是用作动词,沾染之意。《长明灯》:“不知初点人何在?只见当年火至今。”^[7](第 180 页)“点”是点灯之点。罗诗数量词连用,喜欢说“一枝”(与李山甫诗同)、“一种”、“一榻”、“一重”之类,与李诗有重要区别。

宋佚名《爱日斋丛钞》卷三云:“杜甫诗语多用‘安得’二字。《洗兵马行》云: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8](第 95~96 页)文中出例十数条,从一个侧面指出了杜甫诗歌的言语个人风格。受此启发,我们试考察《登高咏菊尽》(《菊》)的语词组合方式。诗中的语词组合,最具特色的应是首联出句“篱畔(下)霜前偶得存”之“篱畔(下)霜前”四字。这是两个并列的定中结构。“篱下”应是指园篱之下,以与结联所用陶潜事相呼应;“霜前”则是霜降之前,亦与陶潜《饮酒诗》所咏时节相应。这种结构方式,罗隐诗中偶见,如《咏史》:“蠹简遗篇试一寻,寂寥前事似如今。”^[7](第 125 页)但这不是罗诗的主流。罗诗的主流是在全诗首句著以四字定中结构,如《忆夏口》“汉阳渡口兰为舟,汉阳城下多酒楼”之“汉阳渡口”^[7](第 27 页),前两字为限定词,后两字为中心词。相同的结构,出现在罗隐众多的七律诗篇首,如《雒城作》、《途中献晋州孟中丞》、《所思》、《江边有寄》、《升平公主旧第》、《归梦》、《甘露寺火后》、《官池秋夕》等诗皆见,这可视为罗诗言语个人风格之一。与罗隐诗不同,李山甫诗喜于篇首用“篱畔(下)霜前”这种两个并列的定中结构。如《月》:“狡兔顽蟾死复生,度云经汉澹还明。”^[6](第 736 页)《送李秀才入军》:“弱柳贞松一地栽,不因霜霰自难媒。”^[6](第 736 页)《南山》:“钝碧顽青几万秋,直无天地始应休。”^[6](第 737 页)《公子家二首》之二:“柳底花阴压露尘,醉烟轻罩一团春。”^[6](第 737 页)《柳》之一:“灞岸江头腊雪销,东风偷软入纤条。”^[6](第 737 页)凡得五例。就今存李诗 90 余首而言,五例已属较多。

以上只是李山甫、罗隐二人诗歌言语个人风格的简略分析,其它方面如虚词、用典、章法等比较尚未展开。但就这些分析来看,我们已大致可以相信《登高咏菊尽》(《菊》)应为李山甫作品,题名为《菊》还应指出的是,前所引李山甫《风》诗中的“深知造化由君力”一句,在遣辞造句、表现方式上,与《菊》诗中的“也销造化无多力”一句惊人地相似,几乎是同一诗句的稍加改动。这也可见《菊》诗系李山甫所作。

运用言语风格学理论指导汉语古文献辨伪,应允许对有关文献的言语时代风格的粗线条描写,即得出某种结论。运用言语风格学理论指导辨异,则应强调对有关文献作出比较细致的言语个人风格描写,在从言语的各个方面进行具体剖析之后,方可作出判断。不论是辨伪还是辨异,必须是“言语”的。就是说,在汉语古文献的辨析中,言语风格学的方法不应被哲学的、历史学的或文艺学的方法所替代。

关于言语风格学与汉语古文献的辨析,我们的认识是:言语风格学理论对汉语古文献的辨析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很高的实际应用价值。汉语古文献与近代、当代文献一样,存在言语时代风格与言语个人风格,因而运用言语风格学理论和方法对有疑问的汉语古文献进行辨析是可行的。以言语风格学指导古文献辨析,前景十分广阔,应当努力开拓,通过行之有效的实践,其成果反过来又能进一步充实言语风格学的一般论述。

注 释:

- ① 古韵韵类用通行三十部说。“明”是阳部字,但鱼阳对转,“明”勉强入韵。“妇”隶之部,“失”隶质部,今且视为合韵。

参 考 文 献]

- [1] 郑远汉. 言语风格学: 修订本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2] 张心澂. 伪书通考 [Z]. 上海: 三联书店, 1998.
 [3] 孔颖达等. 十三经注疏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4] 杨伯峻. 列子集释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5] 阎若璩. 尚书古文疏证 [Z].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6] 曹 寅, 等. 全唐诗: 第 19 册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7] 罗 隐. 罗隐集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8] 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第 325 册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责任编辑 何良昊)

Chinese Classic Writings Stylistics and Analysis

LUO Rui-h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UO Rui-he (1957-),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Chinese phonology and Chinese classics hermeneutic.

Abstract Stylistic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discriminating and analyzing classic writings, part of Chinese classic philology, these two are very close to each other. The general theory of stylistics is of great value to the researchers to analyze Chinese classic writings. It is feasible to guide the analysis by the theory of stylistics. Conversely,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analysis can also enrich the theory of stylistics.

Key words style of spoken and written language; Chinese classic writings; linguistics